

文章编号:1005-0523(2009)06-0115-04

从“三言二拍”看话本小说的可拟性

吴昌林,王莹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明代后期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中的话本是在说话艺人底本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而大量拟话本是模拟话本形式创作而成的,形成了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独有的艺术特色。“三言二拍”深受话本小说影响形成自己“拟话本”小说的特点,说明话本小说的可拟性,这种“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叙述体制的可拟性,话本小说的体制转化为固定的叙述结构;书场交流的可拟性,说话人和听众的现场交流转化为虚拟的叙述语言;艺术风貌的可拟性,艺术风貌方面也体现了对话本小说传统的继承。

关键词:三言二拍;话本;叙述;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话本,其完整的概念应有两层含义,一指说话艺人讲说时用的底本,又指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进行创作的故事文本。拟话本是模拟话本形式的故事文本即白话短篇小说。明代冯梦龙编创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合称“三言”,是我国出现较早的拟话本小说集,凌蒙初后来继续拟话本的创作,写出《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拟话本”来概括。“三言二拍”中的拟话本是模拟话本形式进行创作的,“它们从母体中继承了特有的遗传因子,即说话艺术的特质。”^[1]

现存的所谓宋代话本都是元明刊本,并全都经过元明人的加工,本文暂在此考证结果的基础上用此概念指称宋元话本小说。另外对“拟”话本的研究是着眼于整体普遍性的研究,并非将其绝对化。从文体上看,拟话本到底和话本有什么区别,似乎并不容易明确说出。但鲁迅概括出的“拟”字却是意味深长。不是偏偏咬文嚼字从字眼上作无稽之谈,“拟”作为一种创作特点,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其存在的原因及发展特点值得深究。

1 话本小说可拟性的表现

1.1 叙述体制的可拟性

话本小说的体制特点是适应其表演而逐渐形成的。一篇完整的小说主要由题目、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五个部分组成。题目主要是根据故事情节命名,或者和主要人物形象有关。在“三言”选录的宋元话本中,相当一部分是注有旧名的,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注“宋本作《错斩崔宁》”《计押番金鳊产祸》,注“旧名《金鳊记》”。入话通常包括篇首诗词,头回是正话开始前和正话相同相近或相反的故事,也称“得胜头回”。正话就是小说的主体,篇尾往往用一首诗来总结全篇,提示其劝善惩恶的道德意义。其中入话和头回,起到烘托或反衬正话的作用,以吸引观众兴趣,达到静场的效果。而一旦改作成书面化的文章,静场的作用就不必存在了,小说家可以开门见山直接叙述“正话”。因为话本小说的二元结构有助于接受者更好地领悟小说情节,“三言二拍”普遍继承了这一形式,陈大康认为“含有人话或头回是拟话本模拟话本的主要表现之一。”^[2]

“三言二拍”在叙述上通常运用线性结构。说话是诉诸听觉的艺术,是讲给听众听的,必须从头至尾把一个故事讲清楚。采用顺叙的方式,可以使故事有头有尾,清楚明白,便于听众接受。“三言二拍”虽然已转为书面阅读的小说,但作者仍承袭宋元话本的叙述体制,并且仍然以读者为听众,假想自己为说话人在

收稿日期:2009-05-07

作者简介:吴昌林(1964-),男,江苏南京人,教授。

向听众——读者讲故事,因而并未改变其说书体的性质,从而使得说话中的顺叙以线型结构方式固定下来,同时为了吸引读者,故事的情节设置也是纷繁多姿的。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道:“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摩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欤异拔新,洞心骇目。”从小说鉴赏的审美角度说明了情节艺术的重要意义。如《喻世明言》之《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写因一只画眉鸟害死七条人命的艺术真实,虽是阴差阳错的偶然性巧合,却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隅的缩影,表现了生活真实中的必然性。巧妙的构思让人印象深刻,加强了小说的思想性,显示了作者杰出的艺术创作魅力。另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满含喜剧的巧合,情节回旋跌宕,也是一篇“无巧不成书”的杰作。话本小说常常以设置悬念,即“卖关子”吊起观众胃口留住观众,这种设置悬念的情节构成手法也被“三言二拍”吸收,如《喻世明言》之《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作者一开始就卖起了关子:“看官,今日听我说《金钗钿》这桩奇事。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极大地激发了读者兴趣,获得了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入话及头回在明代中后期的短篇白话小说集中屡屡出现,可见这一适应表演的体制“拟”后的结果是促使文体结构带有拟话本的痕迹。作为一种表演技艺,说话艺术中的“小说”带有表演的特点,带有演唱、手势甚至一两个简单的舞蹈动作。这些表演性的要素并非“拟话本”可以“拟”出来的,但其中语言性较强的部分,如说话艺术中的套语可以在拟话本中有所保留。话本小说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运用了很多叙述套语,这为“三言二拍”所吸收。如“猪羊送屠户之家,一家脚来寻思路”、“分开八块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来”等等。使得“三言二拍”的一些作品较接近早期话本小说的原貌。这些套语对于情节的建构和叙述模式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冯梦龙在改编时受话本小说的影响,还包括引征诗词,一方面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安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拟话本的归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之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中认为拟话本有三个特征:“(1) 须讲近世事;(2) 什九须有‘得胜头回’;(3) 须引证诗词。”^[3]几乎所有的拟话本开头都是诗词。也就是说,明代中后期小说家的继承,不是一支一叶的吸收,而是整体上有意识地模拟拟话本,并且在形式上已经达到了成熟。

1.2 书场对话的可拟性

说话艺术是现场表演的,说话人和观众的交流也是现场适时的,说话人常常利用这种平等的交流平台以特别的提示词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以得到预期的叙述效果。“三言二拍”是纸质的,读者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观看”叙述者的叙述,甚至可以中断当前的阅读进程而选择在后来继续阅读。“三言二拍”为了达到增强其作品的感染力,抓住潜在的观众,一次性完成文本的被消费,作者实施了很多虚拟的交流。“这种理想读者的虚拟使得作者为自己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说话人叙事模式,从而形成说话人与读者间直接交流与沟通标准的拟话本格局。”^[4]这主要表现为通过虚拟对话:

第一种形式是使用“说话的”。如《拍案惊奇》之《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叙述到文若虚与吉零国人做生意占了便宜而与读者作了如下的虚拟对话:“说话的,你说错了!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如此做买卖,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匹,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一发百倍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都是以货交兑。我这里也只是要他货物,才有利钱,若是卖他银钱时,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作了好价钱,分两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是买吃口东西,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我却只管分两,所以得利了。”这里的对话是作者想象表演现场而拟写出来的,有利于展开小说的叙述。又如《醒世恒言》之《吴衙内邻舟赴约》里,“说话的,我且问你,在后舱中,非止贺小姐一人,须有夫人丫鬟等,难道这般着迷光景,岂不看出破绽?”作者解释到只因夫人有午睡习惯,丫头们巴不得小姐不来呼唤,因此并无人知觉发现。作者的这种虚拟对话在完善了情节的逻辑合理性,避免了故事讲述时的漏洞,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而且揣摩读者心理的叙述话语也拉近了叙述者和接受者的距离,接受美学方面也有一定价值。

另外一种虚拟对话的形式是“看官听说”,如《醒世恒言》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里,崔宁和陈二姐被屈杀之后,作者又扮演了“说话人”的角色来澄清事情的原委真相,“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俩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作者虚拟对话的设置是和文本全知视角的采用相关。“三言二

拍”采用全知叙事,结局已经明现,吸引我们的便是事件如何发展如何达成这个结局。例如《醒世恒言》之《灌园叟晚逢仙女》,“只那惜花致福,损花折寿,乃见在功德,须不是乱道。列位若不信时,还有一段故事,待小子说与看官们听。平日爱花的,听了自然将花分外珍重;内中或有惜花的,小子就将这话劝他,惜花起来。”作者直接和虚拟的读者交流,使得读者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可以主动阅读——保留话本中现场对话的方式进行新型的文体变革,即模拟话本创作出“拟话本”。

2.3 艺术风貌的可拟性

话本小说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态之一,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反应市民生活,主人公大多为普通市民,语体上适应文化水平不太高的普通市民的通俗化,具有娱乐的特点。“三言二拍”等作品的文人化特点越来越明显,但在艺术风貌方面可看出“拟”话本的痕迹。晚明社会,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城市市民的急剧增长和重商思想的抬头,有更多的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等成为小说中的主角。例如“三言”所录宋元旧篇《赵伯生茶肆遇仁宗》《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等都是与市民的生活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三言二拍”写世俗的人情百态,主人公还是和话本小说的普通市民主人公相同或相近,尤其是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的主要代表,作为正面的主人公出现,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另外“三言二拍”的艺术趣味也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三言二拍”题材丰富,表现灵活,其中有不少作品属于历史题材,但不是历史实录的讲史,也不是着眼于人物在历史进程的作用,而是注重于趣闻轶事的讲述,富于戏剧性。李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诗人,诗作浩丰,而在《警世通言》之《李谪仙醉草下蛮书》里,作者并未把诗仙李白的真正杰作展现出来,而是通过一篇虚拟的作品夸张李白的才华。这种叙事角度明显是为了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

“三言二拍”在艺术观念上的“拟”话本的结果是以读者为中心,文化水平不太高的普通市民是重要的读者群体,因此描写尽可能形象生动,作品的重点是吸引接受者的故事,但情节叙述尽可能中和,这也是和作者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相应地在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往往用一些俗语、谚语等,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同时,在语言的明白晓畅中人物性格也表现得生动传神。《醒世恒言》之《施润泽滩阙遇友》,施复卖了绸匹,归家途中捡到一个小小青布包,打开一看是两锭银子,又有三四件小块,兼着一文太平钱,心理欢喜道:今日好造化!拾得这些银子,正好将去凑做本钱。捡到意外之财的本能反映让我们看到平凡人的真实,生动的自言自语般的心理刻画使人物形象丰盈可信。于是施复就边走边在心里盘算着有了这些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个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副。那时造什么房子,买多少田产。”对于一个养蚕缫丝生意刚刚起步的小商户来说,六两多的银子的确可以带来很大效用,并且对于施复来说正可解愁眉之急。施复从这六两银子竟然想到十年之后的富足生活,表现了一个小商人作为平凡小人物的可爱。施复的心理活动是真实而生动的,甚至带有某些夸张幽默的成分,然而就是对于得银、失银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猜想,使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三言二拍”并非只有通俗易懂的一面,也有其高雅的一面。正如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所言:“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5]冯氏“三言”既可适俗,又存雅道。如《喻世明言》中的《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对《清平山堂话本》之《柳耆卿诗酒玩江楼》的修改后,把柳永从一个恶人形象改编为主持正义、成全黄秀才和周月仙恋情的地方官。修改后的小说格调提高了,从单纯的风流韵事转变为对柳永人格、艺术才能的肯定,使市民意识小说染上了文人色彩,体现了作者对压抑人才社会的不满。小说的情节集中,文笔也较优美。宋元话本《西湖三塔记》中白蛇以负面形象出现,是一个迷惑人心的女妖,而到了《警世通言》之《白娘子永振雷锋塔》中,白蛇是一个具有市民思想的接近于普通市民的形象。前者在文本中残留着怪诞恐怖的描写,后者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从志怪色彩到浪漫色彩的转变,人物形象本质上大相径庭,小说的主题随之改变,是志怪到爱情的超越。故事以悲剧性的结局作尾,蕴含着悲剧美,给人一种深沉的悲剧力量。拟话本吸取了

雅文学的有用因素,才使其接受群体不拘囿于广大市民,也赢得了封建正统文人的喜爱。相比较“三言”是集结了五六百年间说话艺人累积型创作的作品总集,“二拍”大部分作品不是来自“说话”而是来自对文言笔记小说的改编,因此,作为文人的拟话本,更加能体现雅俗两种文体的特点。

3 结语

“三言二拍”渐渐形成了纯熟的模拟说书情境的叙述方式,为后来的拟话本创作提供了借鉴。“三言二拍”拟话本具有“拟”话本的特点,从中可以窥测话本小说的痕迹,但更多地是具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任何文体的特点,因为任何一种文体的存在必须以独具一格的特色才能成为一种值得探究的文学现象。本文是对其中一个侧面“拟”来探究文学史上的传承意义,如上所述无需赘言。

参考文献:

- [1] 李修生,赵义山.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86.
- [2]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67.
- [3]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5.
- [4] 宋若云.如何讲述——试论拟话本的叙事特点[J].明清小说研究,2002,(1):17.
- [5] (明)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M].北京:长城出版社,1999.1.

On Simulation of Story-telling Script in“Sanyan and Erpai”

WU Chang-lin, WA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Feng Menglong's "Sanyan" and Ling Mengchu's "Erpai"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re on the basis of the huaben of Songyuan dynasty. As China colloquial short story, "Sanyan and Erpai" has formed the characters of "Ni-huaben", and has been affected by story-telling scripts, which proved that huaben novel could be simulated. Simulation consists of three aspects: system of Huaben novels are transformed into settled narrative structu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peaker and audience is changed into virtual language; the artistic style reflects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novel.

Key words: "Sanyan and Erpai"; story-telling scripts; narration; simulation

(责任编辑:王建华 李 萍)